

DOI:10.3969/j.issn.1674-8131.2012.06.03

经济增长理论与空间经济学 双维度下的中国地区差距*

——一个文献综述

仇娟东, 曹 钢

(西北大学 经济管理学院, 西安 710127)

摘 要:通过对经济增长理论、空间经济学及其结合框架下对地区差距及中国地区差距问题研究的回顾发现:经济增长理论能够反映地区差距形成的动态性特征但缺乏空间维度,传统空间经济学对经济活动的空间分布有着较强的解释力但缺乏动态性,二者结合框架下的研究能同时体现动态性和空间维度但缺乏实证检验。基于此分析,今后的研究中应将动态性与空间维度同时纳入地区差距问题研究框架,重视技术进步、知识溢出等“知识关联”因素的作用,对地区差距的发展方向做进一步分析,并拓展创新经济增长理论与空间经济学结合框架下的实证研究方法。

关键词:地区差距;经济增长理论;空间经济学;经济增长趋同;CP 模型;本地市场效应;D-S 模型;知识关联

中图分类号:F061.5;F127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4-8131(2012)06-0020-09

The Regional Disparity in China from the Two Dimensions of Economic Growth Theory and Spatial Economics

—A Literature Review

QIU Juan-dong, CAO Gang

(School of Economics and Management, Northwest University, Shaanxi Xi'an 710127, China)

Abstract: By reviewing the literatures from the field of economic growth theory, spatial economics and their combinational framework on regional disparity and China's regional disparity, we find that the economic growth theory can reflect the dynamic evolution of regional disparity but is short of spatial dimension, that the traditional spatial economics has strong explanation capacity on the spatial distribution of economic activity but lacks of dynamical performance, that the two combination framework can embody the dynamic features and spatial dimension but is lacking of empirical analysis, based on this analysis, the future research should integrate dynamic features and spatial dimension simultaneously into regional disparity issue, emphasize the role of “knowledge-associated” factors such as technological progress, knowledge spillover and so on, further analyze the development direction of regional disparity and expand the

* 收稿日期:2012-09-20;修回日期:2012-10-27

基金项目: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08JJD840187)

作者简介:仇娟东(1986—),男,宁夏隆德人;博士研究生,在西北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学习,主要从事区域经济学研究。
曹钢(1948—),男,陕西子洲人;教授,博士生导师,在西北大学经济管理学院任教,主要从事制度经济学、区域经济学研究。

empirical research methods under the combinational framework of innovative economic growth and spatial economics, etc.

Key words: regional disparity; economic growth theory; spatial economics; economic growth convergence; CP model; local market effect; D-S model; knowledge-associated

近年来,我国经济以近两位数的速度快速增长,经济社会面貌大为改观,国内外学术界称这种现象为“中国奇迹”,然而与这种快速变化相伴随的是我国经济活动空间布局的深刻变化,而地区差距的扩大便是该空间布局变化中凸显出的重要问题。因此,如何缓解和缩小地区差距已成为社会关注、政府关心和亟须解决的重要问题。事实上,经济增长和经济活动的空间集聚作为人类社会中的唯有的两个长久经受检验的经济特征事实(Knaap, 2004),理论界也主要从经济增长理论和空间经济学两方面作了分析与研究,也证实了这两者之间存在相互影响与相互作用。不过,这些研究不仅在理论上存在一定缺陷,在经济增长和地区差距的发展方向上也没有得出一致的结论。基于此,笔者在回顾经济增长理论、空间经济学及两者结合框架下对地区差距及中国地区差距的理论与实证研究的基础上,分析和总结这些研究的特点、进展及有待进一步研究的问题,以期能为地区差距问题的研究及中国地区差距问题的解决提供一些有益的启示和建议。

一、经济增长理论中的地区差距

1. 缺乏空间维度的经济增长理论

以经济增长为主题的研究至少可以追溯到亚当·斯密(1776),尽管他并没有明确提出经济增长的概念,但所强调的如何能够最适当地取得财富和达到富足的问题,从本质上说就是关于一国经济增长的理论。斯密明确指出“分工受市场范围的限制”,其对市场范围的强调说明斯密的理论考虑到了空间对经济发展的影响。随后,大卫·李嘉图通过将环境因素弱化为土地生产力的差异,有效地将空间因素从其分析体系中剔除(Ekelund et al, 1999)。后来,马歇尔、萨缪尔森等人的研究主要以资源配置为主题,从而使空间因素进一步游离于主流经济学之外。

首次明确以经济增长为主题的新古典增长理论,认为长期经济增长是劳动、投资和技术进步的函数,然而完全竞争和规模报酬不变的基本假设,

终将使长期增长因劳动和资本的边际报酬递减而消失,而长期的增长完全被“外生”的技术进步所决定。可以看出,新古典经济增长理论中并没有资源空间配置的影子,地理因素不会对经济增长产生任何影响。随后,以解决技术外生问题而广为流行的新经济增长理论认为,知识在生产者之间的扩散以及从人力资本中得到的收益等,使得资本积累中的收益递减现象得以避免(罗默,2009)。显然,尽管这类模型强调技术因素在经济增长中的作用,但并没有分析知识和技术溢出的强度,从而也就忽略了空间因素。随后,Helpman(2004)将R&D理论和不完全竞争理论引入经济增长分析框架,并认为有目的的R&D活动往往以某种形式的事后垄断作为奖励,如果经济中不存在思想枯竭的趋势,那么长期的经济增长就不会停滞。可以看出,该分析已将地理因素引入经济增长模型,但仅表明一个国家或地区的经济增长和技术进步与地理因素有关,经济增长的内生化仅限于技术因素而没有拓展到地理因素,区位的作用依然游离于模型之外。总之,缺乏空间维度已是经济增长理论的明显特征。

2. 经济增长理论中地区差距的研究

尽管经济增长理论缺乏空间维度,但却涉及对区域经济增长不同绩效的分析,这些分析主要集中在经济增长趋同或收敛的研究框架内。新古典增长理论认为,经济的运行存在稳态,而经济增长便是向稳态发展的过程,这也就意味着不同经济体的经济增长具有一致性的趋势。然而,内生经济增长理论则认为物质资本的积累、人力资本的质量和和技术进步能力的差异等,会导致经济体之间经济增长差异的永久性,从而不会出现新古典经济增长理论所说的趋同现象,经济增长并不必然意味着趋同(巴罗等,2010)。由于新古典经济增长理论与内生经济增长理论在经济增长趋同方面不同的预言,引发了20世纪80年代末以来大量针对趋同问题的研究。具体来说,对不同经济体经济增长趋同性进行实证检验的研究始于Abramovitz(1986)和Baumol(1986)的研究。Abramovitz(1986)的研究证实了生

产率水平和生产率增长速度之间的反向变动关系,不过该关系仅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 25 年左右表现显著,而其它时期却存在明显波动;Baumol (1986) 基于 1870—1979 年麦迪逊(Maddison)数据的研究表明,工业化的市场经济国家存在显著的生产率趋同现象,计划经济国家区域经济趋同表现得较为平均,而不发达国家并没有表现出明显的趋同趋势。可以看出,这两位学者的研究结论存在明显差异,从而也并没有对经济趋同现象是否存在给出明确结论;同时,其研究方法也存在样本有偏、度量误差等不足。不过,这些研究带动了关于经济增长趋同问题研究的快速发展。随着各国经济增长的不断演进和计量经济方法的不断成熟,经济学家对经济增长趋同问题的研究也更为活跃,也相继提出了绝对 β 趋同、条件 β 趋同、 σ 趋同、俱乐部趋同等多种“趋同”概念(巴罗等,2010),对各地区经济增长趋同类型进行实证检验的研究也层出不穷。

3. 经济增长理论中的中国地区差距

我国学者从多角度对中国经济增长趋同问题展开了研究。从研究方法来看,学者们分别运用统计指标法、横截面回归法、时间序列分析法、分布动态法和综列数据分析法(邹薇等,2007),分析了我国各省(市、自治区)经济增长的趋同现象。从所涉及的趋同类型来看,徐现祥等(2004)对我国 216 个地级及以上城市的分析表明,我国城市的经济增长表现出绝对 β 趋同和 σ 趋同,并且该结果是稳健的;林光平等(2006)的研究则重点关注我国各地区经济增长是否存在 σ 趋同情况,结果表明近年来我国各省区经济增长表现出了 σ 趋同;袁立科(2010)等人研究了 1978 年以来我国经济增长中的条件 β 趋同,即东、中、西三大地区内部的条件 β 趋同和三大地区之间的俱乐部趋同;彭国华(2008)等人的研究则表明了我国地区收入的俱乐部收敛特征。从经济趋同形成的原因来看,学者们主要从地区发展战略与政策、地区特定因素、全球化和经济自由化、要素市场扭曲等方面进行解释(刘夏明等,2004)。可见,上述研究并没有对中国经济增长趋同形式得出一致的结论,从而也难以判断中国地区经济差距的具体发展趋势。

综上所述,在经济增长趋同框架下的研究中,起源于不同理论流派的研究对经济活动的解释不

同,学者们相继提出了多种不同类型的趋同形式,对中国的经济增长的趋同性也进行了较为深入的研究。然而,这些研究较多地关注趋同形式,而对趋同原因、过程、机制的研究略显不足。此外,上述研究对经济体的空间相关性与空间互动的研究还显得较为缺乏,这也使得缺乏空间维度成为经济增长理论框加下地区差距问题研究的明显特征。

二、传统空间经济学中的地区差距

1. 缺乏动态性的传统空间经济学

从传统空间经济学来看,德国古典区位论的代表人物 Thünen (1826)、Weber (1909)、Christaller (1933)、Losch (1939) 分别提出了“农业区位论”“工业区位论”“中心地区理论”“市场区位论”,并在区位选择、集聚的动力机制、经济的空间结构等方面作出了重要贡献,但他们的研究存在缺乏空间结构形成的微观基础和内在机制的模型化问题(藤田昌久等,2011),也一直被排除在主流经济学之外。古典区位理论之后的相关研究中,Hoover (1948) 将集聚经济划分为内部规模经济、局部化经济和城市化经济,并提出了导致经济活动空间差异的自然资源优势、集聚经济和运输成本三个基本因素;Isard (1956) 将区位问题表述为一个关于运输成本与生产成本的标准替代问题;Alonso (1964) 推导了居民和城市厂商的租地竞价曲线和农业竞租曲线,进而分析了供求平衡中的地价和地块形状;Henderson (1974) 将整个经济视作一个城市体系,并论证了城市规模与福利之间的平衡以及其决定的城市理想规模(藤田昌久等,2004)。

可以看出,在传统空间经济学的动态演进中,研究者们逐步借鉴并使用经典的主流经济学方法分析区位、城市等空间问题,但这些研究均以匀质的空间为基础平台,从而在竞争性均衡中无法出现城市、专业化的区域和贸易,也无法真正解释区位选择问题;再者,在上述有关空间和区位选择的研究中,一般采用静态分析法和比较静态分析法,从而使地理因素在经济增长和地区差距形成中动态演化的特征不足,也使区位的选择和经济空间布局的形成具有瞬间产生的质疑。产生这些问题的根本原因则在于缺乏将规模经济和不完全竞争纳入经济模型中的理想方法(藤田昌久等,2011)。需要指出的是,是否同时具备非匀质空间和动态性特

征,成为区分传统空间经济学与新空间经济学的重要依据(刘朝明,2002)。

2. 传统空间经济学中地区差距的研究

按照分析的基础理论不同,传统空间经济学框架下对地区差距问题的研究可分为 CP 模型和本地市场效应两类。

(1) CP 模型与地区差距

Krugman(1991)所建立的“核心—边缘模型”(Core Periphery Model,简称 CP 模型)考虑的是一个两种要素(不可流动的农业劳动力和可流动的工业劳动力)、两个部门(完全竞争的农业部门和垄断竞争的工业部门)、两个地区(南部和北部)的 $2 \times 2 \times 2$ 模型,并假设农产品无运输成本,而制造业产品存在“冰山成本”^①。在经济的演化中,受由市场接近效应、生活成本效应形成的“集聚力”和由市场拥挤效应形成的“分散力”及循环累积因果机制的作用,在运输成本足够低、制造业有差异的产品种类足够多和制造业的份额足够大等条件满足的情况下,制造业“中心”和农业“外围”的空间格局终将形成。可以看出,CP 模型框架下对地区差距的研究主要强调两点:其一,集聚力与分散力的形成及其相互作用;其二,循环累积因果机制的作用。CP 模型对“全球范围内城市化快速推进和大都市迅速成长,而乡村地区人口锐减”等经济现象有着强大的解释力,从而在问世伊始就受到了广泛关注。后来,包括 Krugman 本人在内的诸多学者对 CP 模型进行了完善和创新,而以 CP 模型为基础的一系列类似模型也纷纷建立(Baldwin et al,2011)。

(2) 本地市场效应与地区差距

在新古典贸易理论难以完全解释复杂贸易实践及新贸易理论缺乏经验证据的困境下,Krugman(1980)指出在规模报酬递增和存在贸易成本的世界中,那些拥有较大国内需求的国家将成为净出口国。也就是说,若某地对某种产品有较大的偏好和需求,那么该产品在该地区生产将进一步导致较大规模市场上某种产品的分布大于其需求,这就是著名的本地市场效应(Home Market Effect)。至于本地市场效应与地区差距的作用机制,库姆斯等

(2011)指出,本地市场效应的生产函数假设:生产要素除了同质的劳动力之外,还包括属于全体劳动者所有的资本,从而在资本可以自由流动的情况下,所获得利息仍归劳动者所有,地区差距也存在没有拉大的可能性;从模型结果来看,在短期,某地区需求的增加在导致产量增加的同时也引起平均成本的下降,该规模收益递增也将进一步提高厂商的盈利能力,从而那些选择市场规模较大地区的厂商较选择市场规模较小地区的厂商能获得更大的利润;但从长期来看,核心区对新厂商的吸引在加大核心区与边缘区之间差异的同时,也加剧了内部厂商之间的竞争,这也就阻碍了厂商进一步向核心区集聚的趋势;这两种相反力量的共同作用就是“本地市场效应”的效应,而地区差距是否拉大则取决于上述两效应的合力。

鉴于本地市场效应这一概念在新贸易理论中的关键性,检验其是否存在便是一个重要问题。Davis 等(1996)基于 OECD 国家相关数据的检验,并未能发现本地市场效应;然而,在考虑到市场准入因素后,再次对日本和 OECD 国家的需求和产出数据的测算却支持了本地市场效应的存在(Davis et al,2003)。随后,Schumacher(2003)、张帆等(2006)、Crozet 等(2008)分别研究发现 OECD 国家、中国、世界银行观测的 25 个国家等均存在本地市场效应。

3. 传统空间经济学中的中国地区差距

(1) CP 模型与中国地区差距

随着 CP 模型的完善与发展,以该模型为基础对中国地区差距问题进行分析的文献也不断出现。李杰(2009)的分析表明:由贸易自由度提高带来的集聚力和知识溢出带来的分散力,对我国产业布局具有显著影响,并进一步分析了该影响导致地区差距形成的机制。许政等(2010)分析了到大城市和大港口的距离对城市经济增长的影响,并证明了中国城市经济增长与该距离之间的关系符合 CP 模型的预测,这也从另一侧面阐述了中国城市间的地区差距问题。此外,安虎森等(2010)运用循环累积因

^① 在传统的贸易理论中并不考虑运输成本,但现实贸易中的运输成本又是客观存在的,从而保罗·萨缪尔森(Paul Samuelson,1952)创造了“冰山成本”的概念,并建议人们想象货物在运输途中“融化”掉了一些,最终只有一部分能达到目的地,损失掉的那一部分便是运输成本。

果机制分析了东部地区经济集聚、地区差距拉大等问题,并基于此给出了推动我国地区协调发展的政策建议。

可以看出,CP模型框架下中国地区差距的上述研究似乎都建立在这样的逻辑关系上:地区差距的拉大引致减小地区差距的政策需求,而减小地区差距的重要措施则是限制引起地区差距拉大的熟练劳动力、资本等要素向东部地区的进一步集聚,或者推动落后地区熟练劳动力、资本等要素的集聚。事实上,该逻辑是否成立还需通过相应的标准来判断:其一,集聚与地区差距是否存在临界点,即临界点之前进一步集聚将会拉大地区差距,而临界点之后的集聚反而有助于地区差距的缩小,那么在未达到临界点之前政策干预的必要性就值得商榷;其二,区域经济发展不平衡的加剧并不意味着外围地区经济状况的改善。进一步地,若经济活动的集聚对中心地区居民的福利增加大于对外围地区居民福利的损失,从而形成经济学中效率与公平的基本矛盾,在该情形下,是否进一步推动集聚还取决于社会的基本价值观(藤田昌久等,2004)。

(2) 本地市场效应与中国地区差距

张帆等(2006)基于对经典模型改造的研究和实证检验表明,中国至少存在七个显著的本地市场效应,而本地市场效应在全国各地生产和贸易类型的选择上起着重要作用,并建议产业布局时应考虑本地市场效应的分布而不是要素禀赋的分布。钱学锋等(2007)通过对本地市场效应相关理论与实证研究的综述,发现该效应对不同规模国家的影响难以界定,而中国中、西部地区的战略发展举措应注重本地市场的发展。梁琦等(2012)提出解释地区差距的新视角,即异质性企业的区位选择,他们也主张落后地区通过技术引进、人力资本积累等措施提高企业的生产效率并推动区域的可持续发展。此外,范剑勇等(2010)的研究发现,本地市场效应在促进产业集聚的同时不会扩大地区差距,并说明我国沿海地区的产业集聚与区域经济的协调发展是可以兼容的,而该结论的进一步的推论则是加强劳动力向沿海地区的集聚,但同时要消除劳动力市场歧视外来农民工的做法。可以看出,上述关于本地市场效应与我国地区差距分析的结论并不一致,从而导致在“是否进一步推动劳动力向东部沿海地

区集聚”等政策建议上也出现了不一致。

事实上,上述基于CP模型和本地市场效应的分析,具有前提假定(不完全竞争、规模收益递增等)较为现实等优势,但是缺乏对“块状”特征形成中的动态性的认识,对知识经济时代集聚与分散力的变化及其作用机制的分析也显得较为缺乏(Fujita,2007),这些问题与缺陷也进一步导致了不同研究在地区差距问题治理上的思路也不同,因此全面、动态地认识及治理地区差距问题就显得十分必要。

三、经济增长理论与空间经济学结合视角下的地区差距

1. 经济增长理论与空间维度的融合

Dixit等(1977)开发了垄断竞争模型(简称D-S模型),使得垄断竞争和收益递增能够顺利模型化;Krugman(1991)也基于此建立了前文所提及的著名的“CP模型”;随后,藤田昌久等(2011)借鉴D-S模型并结合冰山成本、动态演化和计算机运用,很方便地解释了经济活动的地理结构和空间分布是怎样在“向心力”和“离心力”这两种作用力下形成的问题,从而开创了被他们命名的“空间经济学”的研究。空间经济学将主流经济学长期忽视的空间因素纳入分析框架,以此来分析“经济活动的空间集中何时得以维持”、“在不存在空间集中的情况下,对称均衡何时会变得不稳定”这两个基本问题,并通过这些问题的分析探讨区域经济活动的空间变动及其规律。当然,这些分析还存在一些不足,其中最主要的问题是它们依然属于静态分析,而核心与边缘的形成似乎是瞬间发生的(Ikeda et al,2012),从而并不适合分析经济活动的空间集聚与长期经济增长的关系。但值得肯定的是该分析为将空间维度纳入长期经济增长分析作了必不可少的铺垫。

后来,在上述D-S模型和CP框架的基础上,学者们进一步探索了经济增长理论和空间经济学的融合方式,并发展出一系列分析微观异质劳动者、异质企业与总体经济相互影响的经典模型,重新解释了现实中要素流动、经济集聚与经济活动的地理分布的关系。与传统空间经济学相比,这些模型与分析最明显的特征在于具有坚实的微观基础、体现了动态性问题,这也为传统空间经济学融入主

流经济学提供了有效路径。具体来说,根据他们所关注的要素不同,有关这两者融合模型大致可划分为以下几类:(1) Baldwin (1999)等重点关注了资本的损耗与创造在经济增长及其空间布局决定方面的作用;(2) Baldwin 等(2001)、Mori 等(2005)、Fu 等(2012)重点关注劳动力因素在内生经济增长和经济活动区位选择中的作用,其中第一项研究以劳动力不可流动为基本假设,而后几项研究以劳动力的完全流动为基本假设;(3) Martin 等(2001)重点关注 R&D 对区域经济增长和空间结构的影响;(4) Fujita 等(2002)、谭成文(2009)则从劳动力因素和 R&D 因素结合的视角研究区域经济增长及其空间结构问题。可以看出,这些研究均从最基础的生产要素入手研究经济增长及地区差距的形成机制,从而具有牢固的微观基础,但其也存在缺陷,至少还可以从以下两方面对上述研究做出拓展:其一,上述研究对劳动力流动的假定往往处于极端状态(不流动或完全流动),因而可考虑向劳动力流动的中间状态拓展;其二,知识经济时代,知识溢出、信息外部性等因素在经济增长中具有更为重要的作用(Fujita, 2007),可考虑将这些因素纳入分析框架。

2. 双维度下的地区差距研究

在经济增长理论与空间经济学结合框架下(简称双维度下),上述理论研究也涉及不同地区在均衡条件下的经济增长率不同,从而也间接地引申出了地区差距问题。具体地,根据研究的切入点不同,双维度下有关地区差距问题的研究可分为两方面:一是基于基本生产要素的研究。Faggian 等(2009)、Gennaioli 等(2011)基于对熟练劳动力和非熟练劳动力的区分,分析了不同类型劳动力对区域生产率的影响,进而分析了其对区域经济增长绩效的影响,分析表明:熟练劳动力对区域经济增长有显著正向影响,而非熟练劳动有非显著影响;而 Henderson(2003)、Brülhart 等(2009)基于跨国数据的研究则表明了集聚与经济增长之间的线性关系和“倒 U”型关系。可以看出,关于以劳动力为例的要素投入对经济增长及地区差距的作用方向如何,这些实证研究并没有得出一致结论。二是基于产业组织层面的研究。由于结论的不一致性及中间机制的不明确性等原因,一些研究开始直接检验产

业层面的集聚对经济增长绩效的影响,如 Brülhart 等(2009)、Drucker 等(2012),但前者的分析表明集聚与经济增长之间符合“倒 U”型关系,并指出临界点大约为 10 000 美元;而后者则认为经济集聚并不是产业结构效率提升和经济增长的中间机制,重点在于培养有利于知识溢出和创新的内外环境。总之,从经济增长理论与空间经济学双维度下地区差距研究来看,这些研究从最基本的生产要素(如劳动力等)出发,逐步演化到从产业集聚层面直接检验集聚与经济增长、地区差距的关系,但这些研究结论并没有达成一致,原因可能在于:其一,仅限于对劳动力、资本等单一要素的分析,而经济增长则是多要素共同作用的结果,从而在建模伊始就可能遗漏了一些重要的因素;其二,各方面的研究要么从要素出发分析其对经济增长的影响,要么直接分析产业集聚对经济增长的影响,缺乏一定的系统性。然而经济增长有其内在逻辑,从要素集聚、产业集聚到经济增长和地区差距也有其作用和传导机制,因此,只有在理论上廓清了它们之间的关系,才能进行更为客观、科学的实证检验。

3. 双维度下的中国地区差距

总体上来说,在经济增长与空间经济学结合框架下对中国地区差距问题进行实证检验的研究还比较少见,但一些研究关注了不同要素的空间集聚,并分析了这些集聚与经济增长和地区差距的关系,从而我们将其纳入双维度下的中国地区差距研究。张卉等(2007)的研究表明,产业集聚对经济增长有显著影响,但不同集聚结构对我国东、中、西部地区的影响不同。李胜会(2008)基于以 CP 模型为基础的 LS 模型的分析表明,核心—边缘结构下核心区的经济增长率往往高于边缘区的增长率,从而导致了地区差距,并以我国广东省的数据为例作了验证。何雄浪等(2012)则认为是地区间消费者偏好水平的不同决定企业与劳动力的流动方向,而发达地区则意味着消费者的偏好更加多元化。胡晨光等(2012)认为基于社会关系“嵌入性”的人力资本、技术资本以及实物资本等要素禀赋的“异质性”双重分工,在集聚形成及经济增长和地区差距产生中具有重要影响。可以看出,上述研究在对我国地区差距形成的分析中,已经初步建立了“生产要素—经济集聚—经济增长—地区差距”的逻辑思

路,而需要进一步探讨的是该逻辑形成的具体机制,并结合相应地区的实际数据进行实证检验。此外,双维度下的实证检验不足,其原因主要在于:其一,模型中的一些变量难以在现实中找到合适的表征指标;其二,空间经济学基本假设中的规模收益递增和不完全竞争,具有很强的非线性特征;其三,模型假设相对严格,但放松假设却造成模型难以处理,形成要使用真实世界的数据就必须修正模型但又无法修正的困境(藤田昌久等,2011)。

综上所述,目前的经济增长理论与空间经济学的融合已经取得了一定进展,这为借鉴、吸收、利用不同领域分析的优势,共同解决现实世界面临的问题提供了很大方便,也为从更合理视角分析地区差距问题拓展了视野。但必须指出的是,这些研究还处于初步发展阶段,用其对现实经济问题作实证检验还具有一定的难度,因此如何改进模型进而进行实证检验还有待进一步探索。

四、结论与启示

通过上述对经济增长理论、空间经济学及其结合框架下对地区差距及中国地区差距问题研究的文献回顾,我们至少可以得到以下结论与启示:

第一,应该将动态性与空间维度同时纳入地区差距问题的研究框架。经过近年来的发展,经济增长理论对时间问题的处理方法已经较为成熟;而空间经济学则以经济活动空间“块状”分布为研究主题,且具有不完全竞争、规模收益递增等一系列较为现实的前提假定等优势;因此,若二者结合显然可以将时间与空间同时纳入研究视野,而近几年两个框架结合的一些建模也说明了二者融合具有可行性。总之,地区差距问题是在经济动态增长中逐渐形成的、在地理空间上表现出来的经济现象,从而从时间与空间相结合的视角有利于客观分析地区经济增长差异的内生形成机制,也是全面、客观认识该问题的理想切入点。

第二,进一步重视技术进步、知识溢出等“知识关联”因素的作用。毋庸置疑,劳动力、资本等传统因素对经济增长及地区差距的形成具有显著作用,但技术进步、知识溢出等因素也是对经济增长与地区差距产生作用的更为本质性的因素(Fujita, 2007)。基于此,在智力社会(Brain Power Society),经济空间分布的变化也必将与经济因素和知识领

域的作用双重关联。因此,为全面理解经济增长和地区差距的内生机制,理想的思路便是将劳动力、资本及技术进步、知识关联等因素同时纳入分析框架。不过,这种处理方式无疑会放大模型的复杂程度,进而进一步加大实证检验的难度。目前,具备操作性的思路是在传统因素和知识关联因素中分别选择更为本质性的因素进行分析。

第三,应对地区差距的演变方向做进一步的分析。经济增长理论、空间经济学及其结合框架的理论研究和实证检验,对于是否应进一步促进经济向“核心区”集聚进而推动“核心区”的进一步发展尚未得出相对统一的结论,也就是说,地区差距的发展方向如何还有待进一步分析。事实上,经济增长和经济地区空间布局的冲突所反映的是效率与公平这一经典的经济学矛盾,而该矛盾的解决迫切需要建立一个协助公共决策的整合框架。此外,空间经济学认为由资源禀赋、地理的天然属性等构成的“第一性”并不能完全解释经济集聚与经济增长现象,一些资源禀赋匮乏国家的快速发展也为我们提供了佐证,那么,目前的落后地区或“边缘”地区如何快速发展便是该框架下值得探讨的另一议题。

第四,进一步探讨经济增长理论与空间经济学结合框架下实证检验的方法。针对经济增长理论与空间经济学结合框架下实证检验不足的缺陷,进一步丰富二者结合视角下实证检验的思路主要有:一是进一步完善二者结合视角下的模型,按照既有利于反映客观经济世界、又易于实证检验的思路建模;二是进一步完善和优化数据仿真技术,尽量使该技术能够反映客观经济世界,从而科学指导决策;三是进一步拓展空间计量经济方法,借鉴数理经济学、计量经济学理论,建立一整套包括空间数据统计、空间数据分析、空间数据建模等内容在内的空间计量经济分析方法。

参考文献:

- 安虎森,李锦. 2010. 适度的“政策梯度”是实现区域协调发展的战略选项[J]. 学术月刊(1):73-79.
- 巴罗 R J, 萨拉-伊-马丁. 2010. 经济增长[M]. 2版. 上海: 格致出版社.
- 范剑勇, 谢强强. 2010. 地区间产业分布的本地市场效应及其对区域协调发展的启示[J]. 经济研究(4):207-119.

- 何雄浪,杨继瑞.2012.企业异质、产业集聚与区域发展差异[J].学术月刊(7):82-89.
- 胡晨光,程惠芳.2012.要素优势与集聚经济圈的产业集聚[J].学术月刊(5):86-93.
- 库姆斯,P P T 迈耶,J F 蒂斯.2011.经济地理学:区域和国家一体化[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 李杰.2009.基于空间内生增长理论的区域差异成因探析[J].南开经济研究(3):87-107.
- 李胜会.2008.基于空间经济学视角的地区差距及影响因素研究[J].产业经济研究(5):39-46.
- 梁琦,李晓萍,吕大国.2012.市场一体化、企业异质性与地区补贴——一个解释中国地区差距的新视角[J].中国工业经济(2):16-25.
- 林光平,龙志和,吴梅.2006.中国地区经济 σ -收敛的空间计量实证分析[J].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4):14-21.
- 刘夏明,魏英琪,李国平.2004.收敛还是发散?——中国区域经济发展争论的文献综述[J].经济研究(7):70-81.
- 刘朝明.2002.新空间经济学:21世纪经济学研究的主题[J].中国软科学(3):104-108.
- 罗默 D. 2009.高级宏观经济学[M].3版.上海: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
- 彭国华.2008.我国地区经济的“俱乐部”收敛性[J].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12):49-57.
- 钱学锋,梁琦.2007.本地市场效应:理论和经验研究的新进展[J].经济学(季刊)(3):969-990.
- 谭成文.2009.经济增长与集聚——新经济增长和新经济地理的理论探索[M].北京:商务印书馆.
- 藤田昌久,J F 蒂斯.2004.集聚经济学[M].成都:西南财经大学.
- 藤田昌久,M P 克鲁格曼,A J 维纳布尔斯.2011.空间经济学——城市、区域与国际贸易[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 徐现祥,李邨.2004.中国城市经济增长的趋同分析[J].经济研究(5):40-48.
- 许政,陈钊,陆铭.2010.中国城市体系的“中心—外围模式”[J].世界经济(7):144-160.
- 袁立科.2010.区域外部性、对外开放与中国经济增长条件收敛[J].当代经济科学(4):46-51.
- 张帆,潘佐红.2006.本地市场效应及其对中国省间生产和贸易的影响[J].经济学(季刊)(2):307-328.
- 张卉,詹宇波,周凯.2007.集聚、多样性和地区经济增长:来自中国制造业的实证研究[J].世界经济文汇(3):16-29.
- 邹薇,周浩.2007.经济趋同的计量分析与收入分布动态学研究[J].世界经济(6):81-96.
- ABRAMOVITZ M. 1986. Catching up, Forging Ahead, and Falling Behind [J]. Journal of Economic history (2): 385-406.
- BALDWIN R E. 1999. Agglomeration and Endogenous Capital [J]. European Economic Review(2):253-280.
- BALDWIN R E, MARTIN P, OTTAVIANO G I P. 2001. Global Income Divergence, Trade, and Industrialization: The Geography of Growth Take-Offs [J]. Journal of Economic Growth(1):5-37.
- BALDWIN R E, FORSLID R, MARTIN P. 2011. Economic Geography and Public Policy [M].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 BAUMOL W J. 1986. Productivity Growth, Convergence, and Welfare: What the Long-Run Data Show [J]. The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1072-1085.
- BRÜLHART M, SBERGAMI F. 2009. Agglomeration and Growth: Cross-Country Evidence [J]. Journal of Urban Economics(1):48-63.
- CROZET M, TRIONFETTI F. 2008. Trade Costs and the Home Market Effect [J].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Economics(2):309-321.
- DAVIS D R, WEINSTEIN D E. 1996. Does Economic Geography Matter for International Specialization? [R]. National Bureau of Economic Research.
- DAVIS D R, WEINSTEIN D E. 2003. Market Access, Economic Geography and Comparative Advantage: An Empirical Test [J].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Economics: 1-23.
- DIXIT A K, et al. 1977. Monopolistic Competition and Optimum Product Diversity [J]. The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3): 297-308.
- DRUCKER J, FESER E. 2012. Regional Industrial Structure and Agglomeration Economies: An Analysis of Productivity in Three Manufacturing Industries [J]. Regional Science and Urban Economics(1 - 2):1-14.
- EKELUND R B, HÉBERT R F. 1999. Secret Origins of Modern Microeconomics: Dupuit and the Engineers [M].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 FAGGIAN A, MCCANN P. 2009. Human Capital and Regional Development [M]. Handbook of regional growth and development theories:131-151.
- FU Y, GABRIEL S A. 2012. Labor Migration, Human Capital Agglomeration and Regional Development in China [J]. Regional Science and Urban Economics(3):473-484.
- FUJITA M. 2007. Towards the New Economic Geography in the Brain Power Society [J]. Regional Science and Urban

- Economics(4):482-490.
- FUJITA M, THISSE J F. 2002. Economics of Agglomeration: Cities, Industrial Location, and Regional Growth [M].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GENNAIOLI N, PORTA R L, LOPEZ-DE-SILANES F, SHLEIFER A. 2011. Human Capital and Regional Development[R]. National Bureau of Economic Research.
- HENDERSON J V. 2003. Marshall's Scale Economies [J]. Journal of Urban Economics(1):1-28.
- HELPMAN E. 2004. The Mystery of Economic Growth [M].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 IKEDA K, AKAMATSU T, KONO T. 2012. Spatial Period-Doubling Agglomeration of a Core-Periphery Model with a System of Cities [J]. Journal of Economic Dynamics and Control(5):754-778.
- KNAAP T. 2004. Models of Economic Geography: Dynamic, Estimation and Policy Evaluation[M]. Labyrinth Publications.
- KEUGMAN P. 1991. Increasing Returns and Economic Geography [J]. The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3): 483-499.
- KRUGMAN P. 1980. Scale Economies, Product Differentiation, and the Pattern of Trade[J]. The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5): 950-959.
- MARTIN P, OTTAVIANO G I P. 2001. Growth and Agglomeration [J]. International Economic Review (4): 947-968.
- MORI T, TURRINI A. 2005. Skills, Agglomeration and Segmentation[J]. European Economic Review(1):201-225.
- SCHUMACHER D. 2003. Home Market and Traditional Effects on Comparative Advantage in a Gravity Approach [R]. Discussion Papers of DIW Berlin.

(编辑:夏 冬,段文娟)

《西部论坛》参考文献格式说明

本刊从2011年1期起参考文献采用著者-出版年制标注,根据GB/T 7714-2005《文后参考文献著录规则》及CAJ-CD B/T 1-2006《中国学术期刊(光盘版)检索与评价数据规范》,对本刊参考文献的著录格式做如下说明:

一、正文中的标注

(1)正文中参考或引用了有关文献的地方用“(著者名,出版年)”标注,著者包括个人和机构,中国人著者标注姓名,外国著者只标注姓氏;若有多名著者,只列第一著者,空半格后加“等”或“et al”。如:(李小兰,2008)、(张国民等,2006)、(Skinner,2001)、(Nonaka et al,1995)。正文中已提及著者名,则在其后的“()”内只需著录出版年。如:杨大勇(2007)……

(2)引用同一著者同年的多篇文献,在出版年后标注a、b、c……区别。如(Skinner,2001a)、(Skinner,2001b)。

(3)一处同时引用多篇文献,各文献间用分号隔开。如(孙浩等,1999;李立,2002)。若多篇文献为同一著者,各文献出版年用逗号隔开。如(李小兰,2005,2008a,2008b;李立,2002)。

(4)多处引用同一著者的相同文献,在各处均应标注;若为需要标注不同页码的专著、学位论文、报告等文献,则在括号后用上标标注页码,在文后参考文献表中则不著录引文页码。如(Evans,1983)9-14、(Evans,1983)25。

二、文后参考文献表的组织与格式

各参考文献不编序号,在文后的排列顺序为:首先按文种集中,一般以中文、日文、西文、俄文、其他文种为序;然后按著者字顺(汉语拼音、英文字母)排列;同一著者的文献按出版年排序。各类文献具体著录格式如下:

报纸文章:著者.出版年.文章题目[N].报纸名称,年-月-日(版数,即文章在报纸的第几版)。

期刊论文:著者.出版年.文章题目[J].发表刊物,卷(期数):文章起止页码。(无卷数的,可省略)

专著:著者.出版年.书名[M].出版地:出版者:引用参考部分的起止页码(整体参考时不需起止页码)。

论文集析出文献:著者.出版年.文章题目//论文集著作人.论文集名.出版地:出版者:析出文章的起止页码。

会议论文:著者.出版年.论文题目[C]//论文集著作人.论文集名称.出版地:出版者:引用参考部分起止页码。

参考工具:著者.出版年.文献题目[K].出版地:出版者:引用参考部分的起止页码。

学位论文:著者.出版年.论文题目[D].出版地:出版者:引用参考部分的起止页码(整体参考时不需起止页码)。

标准:主要责任者(任选).出版年(任选).标准编号,标准名称[S].出版地(任选):出版者(任选).(任选是指若查不到可省略)

专利:专利申请者或所有者.公告日期或公布日期.专利题名:专利国别,专利编号[P].

网络文献:著者.文献发表或更新年.文献题目[OL].网站名,[引用年-月-日].网址。

其他文献:著者.文献发布或发表年.文献题目[Z].其他需要著录的内容。

注意:若是期刊文章,请务必给出起止页码。